

# 「中心／邊緣模式」再思考

## ——評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 周潑鷺



彭麗君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以下簡稱《邊城對話》，引用只註頁碼）這本書的出版，緣於2011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

研究學部舉行的一次公開講座。組織者彭麗君教授把台上台下的互動發展成一本學術論文集，然後，中文大學出版社又將其運作成一個出版系列「邊城思想者」，隨後推出了系列下的其他四本著作<sup>①</sup>。到目前為止，「邊城思想者」已經是中文大學出版社運作的中文學術書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邊城對話》，誠如其名，在香港這個相對於「崛起的大國」來說日益被「邊緣化」的「邊城」，開啟了一系列對話和交流的機會，是一本不可忽視的香港研究和中國研究的代表性著述。

《邊城對話》，誠如其名，在香港這個相對於「崛起的大國」來說日益被「邊緣化」的「邊城」，開啟了一系列對話和交流的機會，是香港研究和中國研究的代表性著述。

### 一 從「中港關係」到「中心／邊緣模式」

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宣傳「邊城思想者」系列著作的海報上，可以看到「香港的聲音」五個大字作為海報的標題。匆匆瀏覽海報的讀者可能會以為，這不過是這些年來強

正是在「香港文化主義」如火如荼的社會語境中，彭麗君強調必須繼續正視、甚至是珍視「中港關係」的研究和實踐：「離開香港，不等於是叛徒，細心觀察內地也同時是理解香港的一個方法。」

調關注本土的「香港研究」的又一次吶喊，但此書絕非只瞄準香港社會內部的本土研究；聚焦於《邊城對話》封面的讀者，也可能會被封面的廣告詞所「誤導」——「十多位香港學人……對『中港關係』的憂慮與思考」。之所以說是「誤導」，是因為筆者要追問：此書真的只是關於「中港關係」研究嗎？

誠然，翻開彭麗君的〈導論：中國的邊緣與邊界——從香港出發〉，第一句已經開宗明義：「對我來說，『中港關係』不是一個學術用詞或研究題目，而是一個伴隨自己長大、從沒有消失過的日常生活狀況。」（頁1）在這段話中，編者帶有童年回憶和青春成長的個人化敘述，為本書加入了一絲鮮活的氣息。當下，香港本土主義抬頭，《邊城對話》作者之一的孔誥烽在別處對此作了來龍去脈的概括，認為可以從多個領域的多種趨勢窺見香港本土意識來勢洶洶，比如新民主同盟的政黨口號是「港人優先」；香港民主派政治元老司徒華的民運綱領「中國不走向民主，香港民主沒希望」被很多香港民運人士拋棄，他們主張把香港民運和中國民運區分開來獨自發展；學者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更是說出很多人想說但不敢說的本土自治的強烈訴求……<sup>②</sup>特別是在2014年9月底爆發的「雨傘運動」中，不論是在旺角、金鐘、銅鑼灣，還是大學校園內，都隨處可見「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標語橫幅。

雖然《邊城對話》寫作的時候尚未有「雨傘運動」，但本土主義已經在香港成形，不論表現為極端排外的「驅蝗運動」，還是表現為較為

溫和的「懷舊」與「戀物」傾向，都力圖與中國內地劃清界限。在本書最後一篇文章中，李祖喬把本土主義在文化政治上的主流論述命名為「香港文化主義」，該論述認為城市現代化帶來的經驗差異以及由「六七暴動」、「六四事件」造成的心理創傷構成去國族化的香港文化在1970年代誕生，從此香港與中國大陸在文化上分道揚鑣。李指出，「香港文化主義」有其可信性，不過，這種強調差異的文化想像卻往往忽略了兩地間的微妙連結，要理解香港本土的現象必須將其視為中國政治、歷史的產物。李的文章還原歷史脈絡，委婉批評本土主義只關注本土、不接續「中港關係」如何限制而不是開啟了更多討論。

正是在「香港文化主義」如火如荼的社會語境中，彭麗君卻在《邊城對話》中強調必須繼續正視、甚至是珍視「中港關係」的研究和實踐。這符合她自己的學術經歷：「打從博士論文起題開始，我的研究興趣主要都放在中國上……離開香港，不等於是叛徒，細心觀察內地也同時是理解香港的一個方法。」她開宗明義提出本書的寫作目的：「我希望本書能為我們展現一種不一樣的中港關係。」（頁3）對「中港關係」探索的迫切性以及其被很多本土主義者所排斥和忘記的趨勢，她提出警醒：「如果我們不正面處理跟內地的關係，香港故事只會更說不清楚，香港人也只會更視野狹隘、仇視多元——這是我的最大恐懼。」（頁2）

在本土主義來勢洶洶的語境中重提「中港關係」，重新站在香港去關心中國，是此書「逆流」的勇氣。

其實，本土主義者不是不理解「中港關係」討論的重要性，即便是「雨傘運動」，它真正對峙的對象更多是中共國家機器而非港府本身。如果大家對這一點心知肚明卻仍然和中國劃清界限，恐怕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和更多討論的發生。所以，本書的價值首先在於參與社會運動的對話，重提「中港關係」在香港政治文化實踐中的重要性，這是文化研究強調知識生產需要和社會運動結合起來的傳統使然。

不過，我們還要繼續關心，除了介入社會運動的那部分嘗試之外，《邊城對話》作為一本學術書籍的價值何在？畢竟，這是一本格式規範、行文嚴謹的學術論文集，它的預設讀者和實際讀者可能仍然是學界中人和知識份子。也就是說，重提「中港關係」不能滿足於停留在一個有力的口號的地步，吶喊之後，我們需要認識的是：「中港關係」背後的邏輯是甚麼？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再理論化」(re-theorizing)的工作？研究「中港關係」如何能為整個學術界提供思想助益？筆者認為，《邊城對話》的最大價值可能還不在於重提「中港關係」，而在於它借助「中港關係」作為案例和契機來反思和發展「中心/邊緣模式」(center/periphery paradigm)的理論研究。

其實，從選材和論題可以看出，《邊城對話》早就超出了「中港關係」這個具體案例的較小視野。此書第一部分「歷史：香港以外的邊界」根本沒有處理香港議題，四篇打頭陣的文章分別討論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羅貴祥、余少華)、西藏

問題和台灣問題(孔誥烽和郭慧英)、民國時期的「拉丁化運動」(黃芷敏)，這些都是「中國研究」(當然可以關涉到香港的類似處境，但也沒有直接關係)。編者故意在開頭給出全景、遠景，力圖開闢更多的討論空間。然後，第二部分「生活：中國的邊緣族群」的四篇文章分別討論富士康在內地的工廠體制(潘毅和許怡)、中國農村婦女的生產實踐(陳順馨)、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龔立人)、中國內地的盜版現象與創意產業(彭麗君)。在這部分，鏡頭稍微拉近，開始勾連香港和內地。終於，到了末尾的第三部分「邊城：港中關係的另類論述」才瞄準「中港關係」；略微遺憾的是，這部分的文章只有三篇，相對前兩部分來說少了一篇。其中，關於香港流行音樂及其北上的流動研究(周耀輝)以及宏觀論述「中港關係」的跨境文化政治的論文(馬傑偉)都聚焦於跨境傳播，最後一篇文章把鏡頭拉得最近，聯繫中國歷史政治來特寫了香港社會內部的邊緣群體——愛國左派(李祖喬)。

可見，《邊城對話》演示了具體的案例如何和理論研究接合的過程——超越本土視野，走出「中港關係」案例本身，對「中心/邊緣模式」進行「再理論化」。其實在第一篇文章中，羅貴祥一語中的地指出：「中央與邊緣、主流與少數、內與外、縱與橫、我們與他者，以至糅合與排斥，這些都可以是曖昧辨證的認識論位置，它們構造了我們的世界觀，也左右着眾人的意識形態。」(頁14)也就是說，「中心/邊緣模式」是一種「認識論位置」

《邊城對話》演示了具體的案例如何和理論研究接合的過程——超越本土視野，走出「中港關係」案例本身，對「中心/邊緣模式」進行「再理論化」。

既然「中心」和「邊緣」不是絕對的位置，而是偶然的「認識論位置」，那麼我們必須追問：誰被「安置」在邊緣？誰享有中心地位？這種「安置」如何被「移置」和「取代」？這些問題都是「中心/邊緣模式」最關心的。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它影響深遠，構成了我們的生活、認知和行動的大部分時刻。既然這是一種認知的位置，那麼它是一種想像的建造，我們可以在具體的語境中將具體的事物「安置」(place)在「中心」或者與其相對的「邊緣」之上。那也意味着，當語境變化，時過境遷，之前的「安置」可能變成「移置」(displace)或者是「取代」(replace)。所以，彭麗君在〈導論〉中亦要首先澄清：「我們不會、也不能，把特區和內地直接放在邊緣和中心的對立上，而是通過各香港學者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邊緣的關心和內省，間接聯繫香港和內地的各種邊緣狀態。」(頁4)

正因為此書既關心又超越了具體的「中港關係」，才能容納跨學科不同論題的文章集結出版，而這些不同論題的文章都共用同一種理論關切——「中心/邊緣模式」。讀者或許會繼續追問：「中心/邊緣模式」的理論研究具體是怎樣開展的？把「中港關係」這個案例研究發展為「中心/邊緣模式」的理論探討，究竟有甚麼學術貢獻？

## 二 揚棄「依附理論」： 積極質詢權力關係

既然「中心」和「邊緣」不是絕對的位置，而是偶然的「認識論位置」，那麼我們必須追問：誰被「安置」在邊緣？誰享有中心地位？這種「安置」如何被「移置」和「取代」？這些問題都是「中心/邊緣模式」最關心的。要進行回答，我們必須描

繪特定的「中心/邊緣模式」情境中的權力關係圖譜。「中心」這個位置不管是誰來佔據，都成為了既定的利益享受者，擁有了把「他者」安置在「邊緣」位置並進行支配的權利。彭麗君也說，「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邊緣和中心是一種競賽關係，所有邊緣都在往中心跑，跑輸的只能被拋棄在邊緣」(頁206)。這是一種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關係，所以我們研究的不應該是本質化的「邊緣」和「中心」這些主體本身——因為它們不僅可以被「移置」到其他地方，還可能地位互換，讓人目眩神迷。

比如，在余少華的〈中國音樂的邊緣：少數民族音樂〉一文中，他爬梳歷史資料，詳細地還原了清朝統治者如何將滿洲和蒙古的音樂從之前被鄙視的「四方樂」中淡化、迴避、清洗和「夷」的聯繫，但卻是換湯不換藥，只是置換了內容，而繼承和吸收了之前漢人的「中心」和「邊緣」的思想，也就是說，等級制度沒有變，變的只是具體的位置上充塞的內容。又如，黃芷敏的文章〈文盲、群眾與世界：三十年代中國的拉丁化運動〉也是通過回顧和梳理史料，講述了一段我們今天看起來難以置信的歷史：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佔據「中心」地位的漢語言文化，曾經在民國時期的1930年代發起的「拉丁化運動」中被試圖消滅，提倡者認為只有這樣，漢族才能真正和其他民族平等相處——消除漢語(中心)和其他語言(邊緣)的不平等關係。再比如，李祖喬在〈「香港文化」的邊緣：初探愛國左派的文化邏輯〉一文中亦開門見山地指出，中共主導的國家

文化力量在中國雖然是主導意識形態，佔據「中心」地位，但是在香港這個「邊城」中，「這種國家文化力量仿似置身於其成熟邊緣的文化格局，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頁275）

表面上，線索紛亂，動盪不堪，究竟誰是中心？誰是邊緣？在變幻不定的位置遊戲中，我們能抓住的是甚麼？實際上，這正好說明了「中心/邊緣模式」研究不應瞄準位置上的主體，而應該瞄準位置本身，質詢各種支配和被支配、你爭我奪的權力關係。唯有辨清了權力關係，才能戳中癢處，發揮這種思維模式的最大優點。換句話說，「中心/邊緣模式」研究的賣點應該是權力關係質詢。

回顧理論淵源，「中心/邊緣模式」的一個出處是「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而它正是因為強烈關注剝削、不平等和權力關係而聞名於世。簡單地說，「依附理論」關注國家（state）這種主體在世界格局中（主要是經濟發展方面）的處境，認為一些國家的發展是以另一些國家的發展為條件的，國家與國家之間互相依存，有的國家擔任了主導性（dominant）的角色，可以繼續擴張，而其他國家則只能扮演提供資源給它們發展的依附性（dependent）角色<sup>③</sup>。

「依附理論」的誕生緣於對之前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的不滿，那就是「發展理論」（development theory）——它提出線性發展的理論假設，看重的是「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時間關係，認為所有國家終將從「欠發展」過渡到「已發展」狀態。「依附理論」堅決反對這種天真的看法，

認為「欠發展」不是一個「發展」之前的原始的、純潔的狀態，而是一種支援「已發展」的共時性的存在。所以，「依附理論」更看重的是「已發展」國家和「欠發展」國家之間的空間關係，也就是「中心」和「邊緣」的關係<sup>④</sup>。也就是說，「邊緣」常常被「中心」掠奪，如果兩者被壓迫和壓迫的關係因為全球化資本流動而愈演愈烈，「邊緣」終將難以從「欠發展」過渡到「已發展」狀態。可見，「中心/邊緣模式」和「依附理論」息息相關，說白了，這一脈絡的理論最大的價值就在於把看似理所當然的現象進行「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質詢權力關係。

文化研究學者都同意，「權力」是其學術傳統的中心詞彙，也是社會關係在每個角落中的遍在事實。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響，文化研究認為權力不止是限制性的（constraining），也可以是生產性的（enabling），雖然在大多數時候都表現為限制<sup>⑤</sup>。所以，文化研究特別關注在權力關係的天平中處於「邊緣」狀態的「從屬群組」（subordinated groups）：無產階級（階級）、有色人種（種族）、女性和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人士（性態）、年輕人和老年人（年齡）、農村人（城鄉）……乃至於任何特定的「中心/邊緣模式」中暫時佔據「邊緣」位置的主體。

如果《邊城對話》是一部小說的話，其主人公就是在各種情景中佔據「邊緣」位置的「從屬群組」：中國的少數民族（相對於漢族）、西藏和台灣及其居民（相對於內地）、文盲和群眾（相對於知識份子）、農

「中心/邊緣模式」研究不應瞄準位置上的主體，而應該瞄準位置本身，質詢各種支配和被支配、你爭我奪的權力關係。「中心/邊緣模式」研究的賣點應該是權力關係質詢。

《邊城對話》對「依附理論」缺點的揚棄，就在於沒有只關注「國家」這種主體，而是有多種形式的主體研究。此書還較好地克服了「依附理論」的另一缺點——被認為是過於強調全球化資本主義帶來的外在壓力，而忽略了考慮國家內部原因。

民工（相對於地方政府官員和港台壟斷資本家）、中國農村婦女（相對於農村男人和港台婦女）、中國宗教（相對於中國從未從保障宗教自由的方向、一直從管理和監察的方向來定義的宗教政策）、盜版產品（相對於資本主義主流的版權商品）以及盜版泛濫而屢被嘲笑和指責的中國（相對於自我感覺優越的香港和外國）、以粵語歌曲為主的香港流行音樂（相對於大中華的國語流行音樂）、被邊緣化的香港（相對於「崛起的大國」）、香港的愛國左派（相對於「香港文化主義」）。不管這些主體是人，是城，還是民族、音樂、商品，他們都在各自的歷史語境和社會現實中佔據了「邊緣」的「認識論位置」，也是《邊城對話》的集體主角，雖然這不是必然的、理應如此和無法改變的。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到，此書對「依附理論」的第一大缺點的揚棄，就在於沒有只關注「國家」這種主體，而是有多種形式的主體研究。

此外，此書還較好地克服了「依附理論」的第二個缺點——「依附理論」被認為是過於強調全球化資本主義帶來的外在壓力，而忽略了考慮「發展理論」看重的國家內部原因<sup>⑥</sup>。為甚麼不把外因和內因結合起來考量呢？在〈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制為例〉一文中，潘毅和許怡較有全域觀：在經濟的角度看來，港台的壟斷資本及其管理者（資產階級）佔據了「中心」地位，剝削並依靠來自中國內地的農民工（打工階級），後者成為這一跨境資本積累中的最大犧牲者、被壓迫者、被邊緣化

者。這種取徑可能並不新鮮<sup>⑦</sup>，但這篇文章的亮點更在於沒有將「被邊緣化」的原因單獨歸咎於跨境流動的港台壟斷資本，而認為中國內地的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是主要幫兇——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資源、良好的交通運輸和其他關鍵的基礎設施，打工階級被殘酷地邊緣化是不會單獨由跨境資本鑄成。她們認為，「富士康的壟斷地位是近些年來通過地方政府深入結盟和資本積累所實現的」（頁135）。

「依附理論」的第三個缺點，也是最受人詬病的地方，顯然還在於它過於強調結構的限制而忽略了主動尋找自由的可能。其實，依附可能是一個服從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個被動的過程<sup>⑧</sup>。那麼，處於「邊緣」位置的主體的自由可能在哪裏？或許潘毅和許怡暫時難以為打工階級找到自由的可能，她們較為悲觀，但此書的大多數作者並不急於評價情況的好壞和希望之有無，而是先力圖描繪全域，盡力捕捉情境的複雜性。文化研究始祖霍爾（Stuart Hall）其中一項思想遺產被學生格羅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概括為擁抱（而非逃避、迴避）複雜性，因為霍爾反對任何還原主義（reductionism）、任何認為最後只有一種結果的說法。他認為這種簡約性否定了世界的複雜，沒有幫助我們理解甚麼在繼續發生，也沒有打開更多的可能性<sup>⑨</sup>。在這方面，羅貴祥和彭麗君的研究進路極有代表性。

羅貴祥在〈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角〉一文中這樣

總結：「由邊緣往中心看，或許並不能立刻就改變既有體系的甚麼，只不過是要討回認知上小小的公道，重覓一丁點的平等，讓更多人有機會反思諸種關係的歷史複雜性。」(頁30)單靠書寫雖然難以改變體系的壓迫和不平等的性質，但首先我們要指出其過失，擁抱其複雜性。或許，在擁抱(仔細剖析權力關係的情景)的過程中，反而可能會(意外)發現更多可能。

彭麗君的〈「盜版中國」vs.「創意中國」〉在討論「盜版中國」和「創意中國」的邊緣和中心位置時，是在處理一個特別棘手和紛亂的現象：盜版產品和版權產品(特別是創意工業生產的)雖然都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商品，但前者是邊緣商品，而大量生產前者的中國在這個領域仍然處於世界的邊緣。那麼，應該怎樣評價一個老百姓集體熱衷盜版而官方話語不斷強調創意經濟的中國？彭在文章中拆解了一個又一個帶有偏見的主流指控：中國人素質低才用盜版、中國法規不嚴所以盜版橫行、儒家思想就是壓抑創新、中國通過模仿而製造複製品對國際知識產權市場來說是來自邊緣的破壞性力量……彭指出被忽略的國家內部和外部的種種權力關係，反對輕易把中國的盜版與山寨行為和中國人的道德表現畫上等號，既不藐視山寨，也不將其浪漫化，因為這兩種傾向都「無助我們發掘現象背後複雜的社會和政治運作邏輯」(頁223)。此篇文章不易讀，其複雜、迂迴足以令人迷失，但若能領會到作者的苦心——細緻觀察中國，批判各種簡單、還原

的偏見，盡力提供全域觀的複雜性，描繪權力關係的具體拉扯，就會理解「中心/邊緣模式」雖然正視壓迫，卻不必然走向悲觀的可能。

另外，孔誥烽和郭慧英的文章用「偶然性」(contingency)的概念也走出了「中心/邊緣模式」不必然注定悲觀的另一條路。在〈歷史視野下的「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一文中，孔、郭認為，西藏問題和台灣問題是香港的「一國兩制」何去何從的參照物，這三個地方共用相對於中央的「邊緣」地位。不幸的是，1959年，中共內部冒進派為了急速推動社會主義而擦槍走火，鎮壓了拉薩暴動，「一國兩制」在西藏失敗；而中共又在選擇和不同的台灣政治團體結盟時站錯隊，北京的對台政策亦陷入泥沼。雖然如此，孔、郭並不悲觀，他們認為「一國兩制」在西藏、台灣的失敗和沒有前途不是必然的，這是一個彈性的架構，它的維持需要高度的文化包容和彈性的政治協商。其實，這也是文化研究經常強調的另一個概念——「偶然性」，事物不是固定的(fixed)、最終的(final)和本真的(true)，而是偶然的、根據情況而定的，永遠開放給權力關係組合<sup>⑩</sup>。也就是說，孔、郭並沒有根據「一國兩制」在西藏和台灣的失敗而命定其在香港的灰暗結局，他們拒絕給出預測，只是提醒各路主體應該以史為鑒。

除此之外，龔立人亦在悲觀中挖掘積極的因素，他的〈轉變中的邊緣身份：中國互換政治與宗教〉一文雖然承認由始至終中共都拒絕實現「宗教自由」，宗教一直在中國

彭麗君的文章指出被忽略的國家內部和外部的種種權力關係，作者批判各種簡單、還原的偏見，盡力提供全域觀的複雜性，描繪權力關係的具體拉扯，可見「中心/邊緣模式」雖然正視壓迫，卻不必然走向悲觀。

此書至少有三位作者（陳順馨、周耀輝和馬傑偉）直接表示樂觀和展現希望，他們都相信「中心」和「邊緣」的權力關係可以通過流動來尋找更平等的可能性。

處於被打壓、規管的邊緣地位，但是他的「互換政治」理論框架主張：即使存在中心和邊緣的不平等的壓迫關係，處於「中心」地位的當權者仍然必須採取彈性政策來換取其統治合法性，這就為「邊緣」的被壓迫者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也就是說，關係是雙方互相建構的，「邊緣」不一定完全沒有主動性和自由。龔還不無幽默地總結道：「縱是如此，在黑格爾所講的主人奴隸關係中，宗教可以是偽奴隸，真主人呢！」（頁200）

值得注意的是，此書至少還有三位作者（陳順馨、周耀輝和馬傑偉）直接表示樂觀和展現希望，他們都相信「中心」和「邊緣」的權力關係可以通過流動來尋找更平等的可能性。在〈回應生態危機：從中國農村和平婦女出發〉一文中，陳順馨頗有創意地認為「緣」既可以是「邊緣」，也可以理解為佛家的「因緣和合」、「緣分」，在主體積極的參與下，清清楚楚的界線都可以是不同關係的和合。雖然陳並沒有放棄對權力關係的揭示和批判，但由於方法論的特殊——這是全書中最為「民族志」的經驗主義調查報告，她同情並參與到了被研究對象——中國農村婦女的生活和抗爭之中。她進行的是「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這種研究不以解決具體的問題為衡量研究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反而，「過程是否展示了民主的力量和行動者的主體性，共生了新的知識，創造了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或條件，也是重要的指標」（頁153）。這種不計較短期和暫時的得失，關

注主體的實踐和過程的視野特別強調「主動性」，也證明「中心/邊緣模式」研究不必然走向完全的悲觀和控訴。陳在結論中指出，總覺得有希望，固守的邊界可以通過努力逐漸消融為互動的關係，而且，她還大膽論定農村青年應該留在農村發展，不要盲目進城從而自我「邊緣化」（頁170）。也就是說，有時候「邊緣」可以主動離開「中心」，弱化不平等的壓迫關係。

周耀輝更是直面香港流行文化的癥結——香港電影、香港電視、香港流行音樂都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場合被人批定「已死」、被「大中華口味」「邊緣化」。面對這種從學界到坊間都為之悲號的強大論調，周用三個實例來反駁，認為中心與邊緣的流動的後果「很難說」，這也契合了霍爾的遺產——拒絕任何還原為單一結論的論述。他反對犬儒，更看重希望、熱情、感性，認為「即使處於邊緣，不表示邊緣生產的文化不能流動而逾越邊界，而有顛覆的可能」（頁244）。他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喚醒我們的熱情，即使沒有看到大好的未來，他仍然堅持「沒有出現，不等於不再可能」（頁251）。筆者欣賞他小心翼翼維持希望的嘗試，也認同他的理論資源——墨菲（Chantal Mouffe）和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對當下政治動員的理解：「希望」的政治是一種重要的現象，人們感到被當下各種發展方向所限制了，他們積極想像一種另類的解放可能，這就是希望誕生的地方，這種希望的政治的動員力量不是基於理性和算計，更多來自於熱情、欲望、夢幻，那些不

能還原為理性和算計的能量，正在成為人們建構自身主體性的另一重要來源。所以，希望是不能被根除的，任何政治和社會動員都不能缺少它<sup>⑩</sup>。我們可以應景地看到，「雨傘運動」中很多「大人」嘲笑學生不懂理性、不會計算得失，但他們可能忽視了感性、激情、希望這些非理性的文化政治能量及其可能性。

馬傑偉雖然沒有周耀輝那麼激情四溢，但也流露出對香港文化的期許，從他自身學術歷程的兩次轉軌也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從香港研究到中國研究再到香港研究<sup>⑪</sup>，他近年來對本土文化政治重燃熱情。在〈香港重現：「跨境文化政治」〉一文中，他認為不管中國和香港誰是中心誰是邊緣，在跨境流動中定會看到各種形式的「香港重現」，這是「中港關係」演變的其中一個結果。他還和周耀輝一樣分享對感情及其力量的重視，提出我們應該由「情緒社會學」的理論視野去理解「中港關係」和「香港重現」：「我們看到由事件帶動情緒進而強化邊界、浮現身份這一模式，在近年來反覆強化」（頁268-69）；「香港的集體情緒，歸根究底，又不得不結連到內地與香港日漸緊密的關係」（頁269）。

可以說，除了潘毅和許怡較為悲觀地批判權力關係的殘酷性之外，大多數作者是期許未來的可能性的，至少三位作者表達出明顯的樂觀筆調。所以，筆者認為《邊城對話》對權力關係的質詢過程是積極的（即使是潘毅和許怡的悲觀，亦非絕望，她們想要促請讀者重視在消費愉悅背後看不見的跨境階級剝削）。首先，我們要辨清「結構」，

認出「中心」和「邊緣」的具體壓迫和被壓迫的情景，然後在此基礎上，力圖尋找「主動性」和「自由」的可能。

### 三 位置性：誰在說話？ 站在何處說話？

如果說文化研究在何時何地都會注重對權力關係的質詢，那麼，此書及其倚重的「中心/邊緣模式」的理論貢獻來源是甚麼？答案很簡單，就在於此書編者、作者、出版者和誕生語境所處的獨特「位置性」（positionality）——文化研究認為知識的生產就是政治的實踐，所以知識絕非客觀和中性的現象，而是位置性的結果，也就是說，誰在說話，站在甚麼地方說話，為了甚麼目的說話，對誰說話，這些位置問題十分重要<sup>⑫</sup>。我們要做的是，尋找有生產力的位置，一邊生產知識，一邊反思這種位置的得失。《邊城對話》的位置性，毫無疑問，就是一群香港學者站在香港看中國，大方擁抱香港的「邊緣」地位並發揮「邊緣」的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關注「中港關係」，同時力圖促進對本土的認知。可以說，此書的優點和缺點一樣明顯，就是其香港視角。

仔細分析，《邊城對話》收錄了十一篇文章，共有十三位作者（其中兩篇文章是由兩位作者合寫）。這十三位作者來自不同的學科和院校，有社會學（孔誥烽和郭慧英、潘毅和許怡）、音樂學（余少華）、文化研究（彭麗君、陳順馨、李祖喬）、人文學（羅貴祥、周耀輝）、

《邊城對話》的位置性就是一群香港學者站在香港看中國，大方擁抱香港的「邊緣」地位並發揮「邊緣」的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關注「中港關係」，同時力圖促進對本土的認知。此書的優點和缺點一樣明顯，就是其香港視角。

《邊城對話》缺乏內地人的視角、內地學者的看法和聲音，一方面成全了它的特色和堅持——站在香港看中國；但另一方面或許也限制了它的視野和可能性。《邊城對話》可能只是「邊城中的對話」，而沒有去勾連「中心」和「邊緣」。

傳播學(馬傑偉)、宗教學(龔立人)和比較文學(黃芷敏)。絕大多數作者是在大學任教的講師和教授，兩位作者黃芷敏和李祖喬為在讀博士研究生，前者也有在中港兩地大學的教書經歷。細看「作者簡介」，各位作者的教育背景和學術經歷其實都很跨界和流動，來回於香港、歐美、中國內地、新加坡。但是，不管如何，他們全部都是生長於斯的香港人，目前大多數在香港定居(郭慧英在台灣出生，但她和孔誥烽結為夫婦後一般被視為香港本土學者)。

可是，「中港關係」研究不能只由香港人來參與。遺憾地，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是，香港人可能不得不處理和中國的關係，不得不關心中國問題，但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並不需要關注香港——正如「香港電影中的內地人形象」長期是香港學界的熱門話題<sup>⑨</sup>，可是「內地電影中的香港人形象」卻並非內地學界的普遍考慮。這種學術生產不平衡的狀況，也是「中心/邊緣模式」宰制關係下的後果。但是，我們或許可以有一些出路去改變這個困境。《邊城對話》缺乏內地人的視角、內地學者的看法和聲音，一方面成全了它的特色和堅持——站在香港看中國；但另一方面或許也限制了它的視野和可能性。《邊城對話》可能只是「邊城中的對話」，而沒有去勾連「中心」和「邊緣」。因為「中心/邊緣模式」的再思考，不能只由目前暫時處於「邊緣」位置上的主體來承擔，關係是雙方互相建構的，一種來回激辯的聲音可能更有生產力。何況在歷史上，目前的「邊緣」還曾經是「中心」，未來會不會再調

轉角色還難以預計。所以某種程度上說，2011年的那次公開講座提供了更平衡的視角，當時有很多內地師生參與，也有梁文道、陳冠中等具內地視野、甚至定居內地的香港知識份子參與對話，奏出的樂章略微和此書有異。如果此書能提供內地人看「邊城」的視角，論述將更為全面。

而且，這種「全香港視角」帶來的另一個弊端是本書很多篇章都匆忙以「我城」作結，其實這並非必要的，可能還會顯得多餘。可能是出於對「我城」的強烈關注，即使很多作者的撰文目的是看中國、理解「中港關係」、重思「中心/邊緣模式」，但他們的論文往往都在最後一段匆匆把鏡頭拉回香港，來一段對「我城」的反思和寄望。其實，或許可以多一點從容，少一點顧忌。因為一來前文一直沒有在說「我城」，最後一段突然回到「我城」，很多時候既無力說清楚「我城」的複雜問題，也不能做一些斷言的預測，只得在希望和失望的糾結中以含混的語句結束全文，讓人意猶未盡；二來前文的論述、資料和邏輯都非常清楚，自成一體，突然結束於「我城」，可能會破壞前文自成一體的肌理。如果作者能瀟灑一點，擺脫「中港關係」這種案例討論的約束，坦然奔向「中心/邊緣模式」的理論研究，或許他們能更優雅地暫時跳出「我城」文化政治鬥爭的千頭萬緒，生產更為純粹的學術著作。可能，這是一個苛刻的要求，也是文化研究長期的苦惱——知識生產的學術價值和社會運動的現實關切究竟應該怎樣平衡和兼顧？

## 註釋

① 周保松：《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羅貴祥編：《再見亞洲：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與重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周耀輝、高偉雲：《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② 孔誥烽：〈香港主體意識：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載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12：官商勾結》（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03-12。

③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in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equality*, ed. Mitchell A. Seligson and John T. Passé-Smith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3), 194.

④⑥⑧ Paul James, "Post-dependency? The Third World in an Era of Globalism and Late-Capitalism",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22, no. 2 (1997): 209-10; 210; 217.

⑤⑩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2012), 10; 5.

⑦ 1990年代中期，香港一些文化研究學者已經提出「北進殖民主義」——來自香港的資本家對內地工人進行殖民化剝削，讓香港從被殖民者、去殖民者變成殖民者。參見孔誥烽：〈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載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53-88。

⑨ Lawrence Grossberg,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a Light:

Stuart Hall (1932-2014)", 15 February 2014, [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21895-rage-against-the-dying-of-a-light-stuart-hall-1932-2014](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21895-rage-against-the-dying-of-a-light-stuart-hall-1932-2014).

⑩ John Storey, preface to *Inventing Popular Culture: From Folklore to Globaliz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3), x.

⑪ Mary Zournazi, "Hope, Passion, Politics: A Conversation with Chantal Mouffe and Ernesto Laclau", in *Hope: New Philosophies for Chang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002), 122-25.

⑫ 馬傑偉如此自述：「馬傑偉在1997年後與北上做生意的港人一樣，認為香港太小，機會在神州，十多年的研究項目，都在深圳、廣州、上海、北京。而且香港故事已有成熟的研究，例如：學者們已編輯了十多冊專輯，由文學、電影、城市研究、普及文化等均有論述，1997年前後似乎已經論盡香港。但近年看見香港明顯變了，希望回巢做香港研究。」參見馬傑偉、吳俊雄、鄧鍵一：〈迎接香港普及文化的部落時代〉，載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香港·論述·傳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頁39。

⑬ 參見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Eric Kit-wai Ma,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1999)；盧偉力：〈「媒介拉奧孔」——談香港電影電視「大陸人」形象差異〉，載吳俊雄、張志偉、曾仲堅編：《普普香港（一）：閱讀香港普及文化，2000-2010》（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2），頁122-26。

周潞鷺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與文化  
學系講師